



看看古人都怎么起名字

近日,“子涵梓萱的时代已成过去式”话题,冲上热搜。还记得前几年,梓萱、子涵、一诺霸占新生花名册的时代吗?今年开学新风向悄悄来了,曾经刷屏的爆款名字,占比明显下降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名字。其实古人更是如此——从秦汉时期的“食其”“去病”,到宋代的“希孔”“尧卿”,再到明朝的“妙”字辈姑娘,每个时代都有它的爆款名。

▲晋,“安阳乡侯”龟钮铜鎏金印。来源/故宫博物院

先秦秦汉

烽火中淬炼,祛病消灾的祈盼

战国烽烟与秦末乱世,将“生存”与“忠义”刻进了时人的骨髓,这两种诉求在人名中留下了鲜明的印记。“食其”二字,在古音中与“异基”相近,有子路“食其食者,不避其难”的典故,大体就是后世“食君之禄,忠君之事”的意思,堪称先秦秦汉版的“建国”,在当时的政治军事舞台上高频出现。

陈留高阳人酈食其,年过六旬仍怀揣报国之志,当刘邦兵临陈留时,他拄着拐杖主动求见。面对刘邦的轻慢,酈食其以雄辩之才剖析天下大势,提出夺取陈留的妙计,最终助刘邦获得粮草辎重,为西进关中奠定了基础。《史记》载他“好读书,家贫落魄,无以为衣食业”,却始终坚守“士为知己者死”的信念,后来在出使齐国时,因韩信突袭齐地,为保全信义慨然赴死。

同在刘邦阵营的审食其,早年侍奉刘邦之妻吕雉,在刘邦征战天下时,始终随侍吕雉左右,深得信任。汉高祖六年(前201),审食其被封为辟阳侯,后在吕氏专权时期官至左丞相。尽管后世对其评价多有争议,但“食其”二字所承载的“忠诚侍主”的内涵,在他身上同样得到了体现。

到了汉武帝时期,“食其”之名仍在延续,将军赵食其便是例证。他曾随卫青、霍去病出击匈奴,在漠北之战中屡立战功,后因迷路失期被判死刑,赎为庶人。这位武将的人生起伏,同样印证了“食其”所代表的忠义精神在秦汉军事领域的深远影响。

与“食其”系列的忠义内涵不同,“去病”“去疾”等名字,则直白地表达了古人对健康长寿的渴望。

秦代丞相冯去疾,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位列三公,与李斯、冯劫共同辅佐二世。他名叫“去疾”,寄托着远离疾病的朴素愿望,却终究难敌时代的洪流——当时秦朝已病入膏肓,回天乏术。民变爆发后,冯去疾因劝谏秦二世停止修建阿房宫而被下狱,最终自杀身亡,名字中的美好期许与现实的残酷形成了讽刺的对照。

汉代的霍去病,无疑是“去病”系列中最耀眼的人物。这位少年将军17岁随卫青出征,率八百轻骑深入大漠,斩获匈奴两千余人,

被封为冠军侯;19岁指挥河西之战,歼敌四万,打通丝绸之路;21岁率军直抵狼居胥山,成就“封狼居胥”的千古佳话。然而天妒英才,霍去病24岁便英年早逝,这个承载着健康祈愿的名字,终究没能留住这位战神的生命,只留下“匈奴未灭,何以家为”的悲壮誓言。

刘邦麾下的曹无伤,名字中同样带着“去灾避祸”的意味。作为刘邦的左司马,他却在鸿门宴前向项羽告密,试图邀功请赏,最终被刘邦诛杀。“无伤”之名,与其背主求荣的行径形成强烈反差,成为历史上一个耐人寻味的注脚。

两汉魏晋

从保家卫国,到玄学清谈

汉代的边疆烽火,催生了一批充满尚武精神的名字,“破奴”二字,堪称武将“标配”。

汉武帝时期的赵破奴,早年曾沦为匈奴俘虏,后逃归汉朝,凭借对匈奴的了解屡建奇功。史载他“尝亡入匈奴,已而归汉”,这种特殊经历让他对“破奴”二字有着更深的体悟——既是对匈奴的军事打击,也是对自身屈辱经历的超越。

与“破奴”相比,“充国”“定国”“安国”等名字,更侧重于对国家安定的期盼。西汉名将赵充国,历经武帝、昭帝、宣帝三朝,在平定羌族叛乱中功勋卓著。他提出的“屯田策”,不仅解决了边疆军粮问题,更促进了民族融合,其名字“充国”(意为充实国家,使国家更强大,担当国家栋梁)与他的治国方略完美契合。汉宣帝曾称赞他“万邦咸服,靡有兵革之事”,这份评价恰是对其名字内涵的最佳诠释。

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代之一,政治动荡,生命无常,加之士族子弟不必埋头苦读经学,转而以清谈、品鉴人物、艺术创作彰显身份。上行下效,魏晋风度造就了截然不同的命名潮流。此时频繁出现的“秀”字名,带着玄学清谈的飘逸,如同那个时代的文人风骨,又几分狂放与不羁。

向秀作为“竹林七贤”之一,以注《庄子》闻名于世。在嵇康被司马昭杀害后,向秀被迫出仕,却始终坚守内心的淡泊,其《思旧赋》字里行间满是对故友的怀念,展现了“秀”字背后的真性情。

地图学家裴秀,被誉为“中国科学制图学之父”,他所创的“制图六体”对后世影响深远。其名字“秀”,不仅指才华出众,更暗含“经世致用”的抱负。在西晋政权更迭中,裴秀始终以学问辅佐朝政,成为玄学盛行时代少有的务实学者。

更有趣的是,西晋同时期竟出现了两位名为“孙秀”的人物。一位是东吴宗室,后归降西晋;另一位是赵王司马伦的亲信,在“八王之乱”中扮演了重要角色。这两位“孙秀”,一忠一奸,一贤一佞,却共享同一个名字,成为西晋社会复杂多元的生动写照。

唐宋

崇文尚德,追慕圣贤

进入唐代,随着科举制度的完善和儒家思想的深入人心,人名逐渐成为彰显伦理道德的载体,“仁义礼智信”系列名字大行其道。

狄仁杰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,据《旧唐书》记载,他任大理寺丞时,一年审理案件一万七千余起,无一人诉冤。武则天称他为“国老”,在他去世后感叹:“朝堂空矣!”这位被后世誉为“东方福尔摩斯”的名臣,真正践行了名字中的“仁”字。他善于断案的故事,在敦煌出土的《狄公案》写本中就有生动记载。

战功赫赫的将领裴行俭,名字取自《论语》“其身正,不令而行;其身不正,虽令不从”与“俭以养德”的教诲,恰如其分地概括了他“文武兼修、廉俭奉公”的一生。

程咬金(程知节)的名字变迁,更能体现唐代伦理对人名的影响。他早年以勇猛著称,在瓦岗寨起义中崭露头角,后归顺唐朝,成为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。“咬金”之名充满草莽气息,而“知节”则取自“知礼节、守节操”的儒家思想,这种改名行为,折射出唐代社会对文人武将兼具伦理修养的期许。

杨国忠与李德裕,则从正反两面演绎了“忠”“德”二字的内涵。杨国忠凭借杨贵妃的裙带关系权倾朝野,但其“忠”名之下,却是结党营私、祸国殃民的行径,最终在安史之乱中被乱兵所杀,成为“名不副实”的典型。而李德裕作为晚唐名相,在“牛李党争”中坚守立场,推行改革,辅佐唐武宗开创“会昌中兴”,其名字“德裕”(德行充裕)与

其政绩相得益彰,成为唐代“德政”思想的践行者。

宋代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高峰期,理学兴起,社会崇文尚德。以圣贤为名的风尚,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对道德修养的重视。“希文”“希尧”“舜卿”等名字应运而生,成为文人雅士的身份标识。

范仲淹(字希文)的一生堪称士大夫典范。他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名句流传千古。这位心系天下的贤臣,确实不负“希文”之字。他的《岳阳楼记》不仅是文学经典,更是中国士人精神的写照。

宋代的“圣贤系列”名字,不仅流行于男性,女性中也偶有体现。理学家朱熹的女儿名“朱兑”,“兑”在《周易》中代表“少女”,同时暗含“效法兑卦之德,刚中而柔外”的期许。

释道“妙”用

温婉贤淑的女性取名典范

明代虽然距宋代已远,但文化上仍有延续。“妙”字辈名字的流行,展现了传统文化中对女性美德的期待。

明代女性的“妙”字名,带着佛教文化的空灵与柔美。“妙”字在佛教中意为“精微奥妙”,如“妙法莲华经”“妙音菩萨”等,随着明代佛教的世俗化,这一词汇逐渐融入女性命名中。

明代名臣王鏊的家族女性,堪称“妙”字名的典型代表。据《震泽集》记载,其祖母叶妙贤虽为女子,却通晓经史,悉心教导孙儿,培养出了这位“吴中四才子”之一的杰出人物。祖母叶妙贤、母亲叶妙澄,名字中的“贤”“澄”与“妙”结合,既体现了佛教的“贤善”“澄明”思想,又符合传统女性的品德要求。王鏊的五个女儿中,妙清、妙隆、妙员三位的名字,更是将佛教意境与家庭期盼融为一体——“清”取“清净无染”之意,“隆”含“福泽兴隆”之愿,“员”则与“圆”通,象征“圆满吉祥”。这种几代人延续使用“妙”字的现象,反映了佛教文化在明代家庭伦理中的深度渗透。

明代著名女医谈允贤,虽未以“妙”为名,但其《女医杂言》中记载了许多名为“妙真”“妙善”的女性患者,侧面印证了“妙”字名在当时的流行程度。这些名字不仅是个人身份的标识,更是佛教信仰与世俗生活相互融合的见证。

看完这些爆款名字,不得不感叹历史是个轮回。霍去病的英武、狄仁杰的仁德,范仲淹的忧乐情怀——每个名字都是个微型历史剧本,承载着中华民族最珍贵的文化基因。

林生

来源:《国家人文历史》